

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表达与现实展开

——兼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邱卫东 孙力

摘要 面对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的内在矛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结合具体境遇得出了系列逻辑贯通的科学社会主义论断。但结合资本全球积累结构的演变来综合反思社会主义的百年实践历程,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地认知到,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对称积累的历史格局下,社会主义实践在全球范围内已本质地表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边缘落后国家的历史规定,必须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始终坚持基本原理与时代创新的内在统一中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开拓发展,必须看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最新展现。

关键词 资本积累 贫困积累 科学社会主义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者邱卫东,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孙力,华东理工大学特聘教授(上海 200237)。

自苏东剧变以来,思想舆论界出现了一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具有合法性的质疑。为有效回应此类质疑,我们必须走出偏重经验论和自我循环论的话语形式,进而在逻辑与实践的一致性中,论证社会主义作为人类新文明类型的科学性及其走向实践的历史必然性,论证中国共产党人在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创新内在统一规律的基础上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实践将会促进科学社会主义的深入发展。

一、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论断及其内在逻辑

对资本主义内在否定性的揭示,是科学社会主义极为重要的精神内核,它贯穿在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整个分析之中。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矛盾而导致的内在否定性,主要表现为三个方

面:(1)处于激烈市场竞争中的私有资本在最大限度地榨取劳动者的“人的自然力”,并将其最大限度地转化为资本。资本积累的最大化与最大限度地压低劳动者收入所产生的矛盾对立,必然产生无产阶级经济上的贫困积累。被源源不断生产出来的商品因整个社会的消费不足而导致过剩性经济危机。(2)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增值,资本极力汲取“自然界的自然力”,并将其最大限度地转化为资本,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之中。这一过程必然会使整个生产机制因过度损耗公共与自然环境资源,而导致整个社会在公共资源和生态环境上的贫困积累,由此生成了生态危机。(3)为最大限度实现自身增值的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榨取社会组织中的“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并将其最大限度地转化促进自身增值的工具,因此人在生命的社会发展空间上的贫困积累,以及因服从资本增值逻辑所导致的系列危机必然形成。^①

* 本文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习近平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贡献”(项目编号:2018BK500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帝国主义论》的时代困境:历史根源及当代启示”(项目编号:17YJC710066)的阶段性成果。

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之间的上述矛盾，决定了曾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因而曾经是人类社会发展新时代重要标志的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历史的、过渡的性质”^②，且必然会被更高的新文明类型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取代。当然，倘若对照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解认知社会发展问题时始终坚持的“两个绝不会”思想，我们在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时，同样也必须考虑社会发展演进的动态进程，并具有两大历史自觉：一是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为理论基石、旨在克服资本扩张悖论进而探索人类新文明类型的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绝不是一种应然状况；就其现实性而言，当且仅当某个国家或某片区域内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的矛盾对立，发展到必须要用社会主义这一方式来克服化解的时候，新文明类型才会在问题倒逼中产生。二是坚持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原理方法、坚持以人民为本而非以资本为本的价值立场，这些毫无疑问都是科学社会主义必须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但“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这一基本事实，也意味着原理、方法或基本原则的实际运用，必须随时随地都要结合具体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

综合来看，具备上述两大历史自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特别反对固化或教条化地运用他们的学说，并始终根据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样态，适时地调整斗争策略，这些探索实践在下述本质关联、内在贯通的一系列科学社会主义经典表达中得到了体现。

第一，社会主义革命必将在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爆发是科学社会主义论断的最初表达。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现实中的社会主义革命从地域空间上来讲，只能发生在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1881年，马克思仍坚信虽然“只能预见，而不能亲眼看见”社会主义革命，但后继者必将“面临着人类未曾经历过的最革命的时期”^④。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经典表达的总体框架内，马克思始终有结合具体条件的变化对已

有论断作出调整的自觉。具体而言，在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特征的认知上，我们一般都在强调马克思所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通过不断革命来“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进而消灭由此“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⑤的经典论断。实际上，在经历了巴黎公社的实践后，马克思对之前的预见进行了完善。在他看来，由于“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完成……‘资本和地产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⑥，因此必须思考和面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继续利用和发展资本的问题。这一看似矛盾的表述，恰恰是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和方法的具体应用必须“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⑦的最好印证。

第二，跨越“卡夫丁峡谷”论是基于科学社会主义原初论断的逻辑延伸。马克思在《给查苏里奇的复信》中曾提出，如果俄国“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⑧，则可以不经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一论断成为开拓科学社会主义新发展道路的引领，但也遭遇到诸多质疑。其关键在于，这一论断是否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阐释根本一致。总体来看，马克思对这一命题的论述十分审慎。而坚信西欧无产阶级必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则是马克思得出这一论断的基本前提。其内在逻辑分为三个层次：首先，当时的俄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不像东印度那样已经在资本全球扩张的过程中变成了殖民地从而陷入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聚集的卡夫丁峡谷。其次，就具体国情而言，俄国国内存在的土地公有制，确实能为其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提供该社会形态所需的“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不仅如此，俄国公社与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就能为俄国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提供“大规模组织起来进行合作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⑨。最后，拥有上

述两大有利的历史条件，再加上对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必将而且很快就要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预判，马克思认为当时的俄国完全可以搭上历史的便车进入更高的社会形态。相反，如果俄国不能抓住这一历史机遇而继续走通过瓦解农村公社进而走向资本主义的老路，那必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进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⑩。正是基于上述认知，马克思在之后面对俄国民粹派对农村公社历史地位的任性解读时，明确表明他对这种脱离基本历史前提的主观臆断“从来不抱乐观的看法”^⑪。即使到了1894年，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仍不忘提醒：只有西欧无产阶级通过战胜资产阶级进而实现“代替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变革，才是俄国公社有可能上升到同样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⑫。

第三，帝国主义论是基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重大跨越。20世纪初，面对1896年以来德美经济危机的化解和资本主义世界强劲复苏，第二国际内部一时不知如何应对因而陷入内部分裂。列宁借鉴当时奥地利经济学家希法亭的《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和布哈林的《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根据资本主义世界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样态指出：当时的“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⑬在建立福利保障体系的过程中，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内无产阶级随着贫困积累威胁的日益减缓而出现了阶级意识日益淡化，改良之声日渐压过革命诉求。相比之下，当时被迫卷入资本全球扩张体系的边缘落后国家，则依旧在落后就要挨打的丛林法则下遭受着舰炮政策。

列宁了不起的贡献在于，他关于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理论和实践的论断，不仅秉承了《资本论》的精神，而且还得出新论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蔓延、渗透，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把原本只是局限在自身内部的“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矛盾不断扩展至边缘落

后国家，这一发展态势意味着这一生产方式已经进入它最高的和最后的阶段，因而无疑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⑭。俄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矛盾对立最为深刻的场域，即列宁所言的帝国主义链条上的最薄弱环节，必将成为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革命的桥头堡，点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正是这一具有时代高度的理论，才真正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向实践的巨大飞跃。

二、科学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展开

十月革命以来，作为实体意义上存在的社会主义，也面临着许多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的新变化。首先，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之后，资本主义再次出现深刻变化。列宁逝世后，尽管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危机，但社会主义革命并未由此爆发。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还经历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政治运作稳定，经济稳步发展，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以至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东剧变时，弗朗西斯·福山直言历史已经被资本主义文明所终结。其次，当代社会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和进行了空前变革。中国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不同于苏联时代的传统社会主义，开拓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路，但像卡尔·波普尔这样著名的西方学者仍然得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已被证伪的结论。最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重置了两大制度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所阐述的世界历史已经表现为全球化。国家间、地区间、民族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命运相连的态势越来越明显。不同制度之间的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斗争离不开联系，交流包含着冲突。

如何直面现实展开过程中的社会主义与其原初理论表达间的巨大反差，进而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其现实进程统一起来？对这一时代之问的解答，必须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现实相统一的前提下展开探析。

第一，科学社会主义必须直面资本运行的时代变化。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的冲突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况。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为克服自身内部由作为资本积累的矛盾对立面而来的贫困积累，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在问题倒逼式的过程中，日渐通过诸如实施八小时工作制、降低劳动强度、提高工资福利、推行股份制、承认工会组织合法性等举措，来探索矛盾危机的化解之道。对此，马克思早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就对这种试图用和平手段处理畸形关系、劳资双方边界界定十分模糊的复杂现象予以了深刻揭示。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借助交通、科技和信息革命进行全球扩张的过程中，开始通过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及金融资本链以及自由、民主、人权、博爱等“普世价值”光环的掩护，更为有效地将世界各个角落都紧紧地编织进了资本积累网络。原本那种通过对边缘落后国家血腥掠夺和野蛮战争的早期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方式，现在已日益转变为更具文明外观的资本全球积累格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高附加值产品的研发、核心技术和专利的绝对掌控，再加之对全球营销网络及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导，逐步在强大的资本积累基础上建构起福利社会与消费社会。原本那种由资本扩张悖论形成的国内矛盾由此被大大消解。相应的，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加工制造业及其负载的贫困积累威胁，则被不断转移至边缘落后国家。以低工资、低福利、低效益和高消耗、高污染、高事故为典型反映的“三低”“三高”现象，开始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和外围大幅呈现。

第二，科学社会主义实践道路必须创新是具有历史依据的。对照“两个绝不会”理论来综合审视变化发展的资本全球积累结构可以发现，整个世界自马克思、列宁逝世以来，就日益清晰地呈现出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相分离的发展态势，资本主义国家成为资本积累的轴心，贫困积累则愈发集中在边缘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的诞生条件由此在全球范围内发生

分离^⑤：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高度社会化的条件下，确实已经具备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条件，但由于其国内的贫困积累远未达到无以延续的顶点，因此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并不具备社会主义诞生的完整条件。诸多边缘落后国家则因为在客观上受到国际垄断资本力量的掌控，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整体上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乃至最底端，且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环境、资源及经济社会发展上有被不断逼至贫困积累顶点的态势，因此主观上具备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迫切需求。但另一方面，由于这些边缘落后国家的国内生产力发展以及社会化大生产远未达到顶点，有些甚至还缺乏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的指导，因此也不具备社会主义诞生的完整条件。可以说，这正是科学社会主义在现实演进中面临的时代背景，也是其必须突破既有认知形式、不断调整创新的历史依据。

第三，科学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深入发展的核心区域为边缘落后国家。现实中拉开社会主义革命序幕的国家，往往集中在那些饱受西方垄断资本压迫支配的边缘落后地区。按照社会发展演进的“两个绝不会”理论，有一点我们必须始终保持足够的清醒：那就是在这一总体历史格局下，对于那些无论是通过暴力革命亦或其他途径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而言，其不管是为了发展自身生产力以满足社会主义所必须的物质条件，还是为了有效克服世界体系中的资本扩张悖论，都必须在与国际资本同存共长的世界体系中实现发展。因此，面对这个由资本主义国家主导推动，通过各种产业链“文明”地将整个世界纳入国际资本增值体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经济共同体，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通过斗争与合作关系的辩证转换实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做到既能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又能克服资本扩张悖论避免被重新引入贫困积累的境遇，进而真正实现民富国强和全球经济正义，已成为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现实诉求。

上述分析为我们认识科学社会主义总体进

程、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开拓创新的内在一致性提供基本理路。它同时也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启示：首先，十月革命绝非如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葛兰西所言的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⑩。就其现实性而言，它无疑是资本主义国际体系内的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在历史辩证运动过程中的鲜活展现。其次，现实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恰恰是在全球范围内都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后的必然要求，绝不存在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真正跨越。最后，对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分析评判，必须放置在全球社会主义实践的总体进程中去考察。割裂的、管中窥豹式的观察，要么把科学社会主义的与时俱进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对立起来，要么把苏东剧变当成是社会主义的历史终结，要么认为中国在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下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对宗旨使命的违背或偏离，这些结论都是不科学的。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最新境界

全面回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历程，在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认知前提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开辟了 21 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第一，探索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创新相统一的内在逻辑。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的实践，既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也创新和发展了其理论体系。对于在经济社会发展落后背景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而言，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意味着达到了甚至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这本应该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这种与发达资本主义的差距，也使新生的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社会主义必须具备高度发达的“物质条件”，但关起门来搞建设不仅不会成功，而且只会因不能有效学习借鉴资本主义文明的优秀成果而带来更大的挫折。这就意味着，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方落后国家，其必须秉持开放

发展理念进而主动融入主要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另一方面，倘若这些落后国家只是以弱国姿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出场，将极有可能重新处于国际产业、商业以及金融价值链的被支配地位，从而依然成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转嫁内在矛盾的目标地区。

这也逻辑地决定了这一背景下的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必须克服两大悖论：一方面，既要保护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民族工业，进而快速积累起能与国际垄断资本相抗衡的物质力量，从而为有效抵制资本主义的侵蚀和掌控、同时也为自己在现代国际体系中赢得生存的空间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又必须最大化和最优化地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这恰恰是马克思东方道路思想的现实诉求。这也意味着这些国家必须进入为资本主义所主导的世界市场，实施对外开放战略。在西强我弱的资本全球积累总体格局中，这势必又会涉及到合作与斗争、独立自主与牵制支配、积极影响与反面渗透等错综复杂的因素。可以说，这一过程不仅在形式逻辑上自相矛盾，而且在实践逻辑上也是挑战重重。而如何破解这一矛盾就成为当代社会主义面临的挑战，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和当代创新相统一的关键所在。

第二，经历巨大波折而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在现实展开中所需直面的悖论式难题作出了精彩回答。回溯社会主义的百年实践历程，我们在今天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东方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在通过革命成功夺取政权后，确实需要运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强大力量，在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基础上，充分利用政府行政指令而非市场力量来配置资源。因为这其中内含的社会主义本质定向，既有效避免了按照资本逻辑扩张的不均衡经济体系和社会发展结构，也有效矫正了欠发达国家常见的被国际资本扭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体系，从而在契合广大人民根本需求的过程中，有效避免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走过的歪路。否则，也就无法尽快初步建立起能与

强大的国际资本相抗衡的经济发展体系。无论是苏俄还是新中国，它们以较低代价快速建立起相当完整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这种建立在公有制、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国家资源配置，对后发展国家建立本国独立的现代工业体系，的确具有难以比拟的优越性。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法比拟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前的探索实践对不可替代的当代中国而言确实具有奠基性贡献。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共产党努力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初设想进行探索，但既没有把原初设想看成只能照搬的公式，更没有囿于先走一步的苏联模式，而是始终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不断开拓社会主义的新路。毛泽东就在《论十大关系》中描绘了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中国设想。尽管后来付出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沉重代价，但每一次失误之后都紧跟着后来的反省，越是大的失误，反省就越是深刻，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就越能达到新的高度。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的自我反思就已深入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制度和理论的基础层面，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重大开拓性论断。

正是因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前提下不断守正出新，当代中国终于在通过坚持改革开放（改革即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就是社会主义制度适应于时代挑战的健康成长；开放即我国突破社会主义建设原有的那种封闭半封闭状态，融入到世界体系并充分运用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坚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主动谋划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进而起决定性作用，坚持探索如何正确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进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终于使得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日益显著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充分凸显出来。在此基础上积极构建大国外交格局并深入推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则更有利于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文明成果来壮大自身力

量。实践证明，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具备引导驾驭资本力量来为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服务的能力，充分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这样的伟大创举不仅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也迅速地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促进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这样的实践探索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是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证实而不是如波普尔所言的证伪。

第三，在直面具有新时代特点的矛盾挑战中生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的最新发展。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断开拓，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从“短缺”经济时代走向了某些产能丰裕的“过剩”经济时代。当前我国GDP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人民幸福感和获得感进一步增强、宏观市场投资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生态建设日益深化、一幅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风景图跃然眼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体系的日渐成熟，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正面影响。继伯格斯斯坦认为“今天的中国正在成为一个世界强国”^⑩后，马丁·雅克也指出“中国的崛起将改变的不仅仅是世界经济格局，还将彻底动摇我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⑪

当然，伴随着当代中国愈益迈向国际合作竞争的深处，由于当前的发展体系在当下深刻的一体化进程中并未在总体上超越垄断资本主义的框架和阶段，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试图将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永久控制在国际产业链中低端，进而维系自身超额剩余价值来源的“丛林法则”；再加之我们在发展中因体制机制不完善、改革不到位而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生态领域出现的系列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不相一致的矛盾与挑战的叠加，使得当代中国在克服资本扩张悖论的过程中不得不面临系列伟大斗争。诸如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中等收入陷阱”、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木桶效应”问题、国际关系上的“修昔底德陷阱”、关乎道路与方向的政治文化领域的“话语权陷

阱”等挑战，都将以前所未有的形式表现出来。

这意味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然随着滚动的历史车轮行进到了中国由大变强、由富转强的转折点。面对这一阶段上“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是前所未有”^⑨的新形势新任务，我们既要具备从最坏处着眼，更要做最充分的准备，必须认识到我国实现伟大梦想必然面临着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伟大斗争，要时刻保持忧患意识，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考量当前和未来发展中的战略问题，从而不断开拓科学社会主义新境界。

当前，新时代的中国正在通过对内继续深化改革，全面探寻新时期有效克服资本扩张悖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正义、满足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追求的发展之道；对外则准确把握全球政治经济的运行规律、矛盾弊端、内在限度和发展趋势，全面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并适时推动变革，在“共商共建共享”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决难题中不断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体现科学社会主义最新发展要求的中国方案逐步提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由此也被引入到更高更新的阶段。当然，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在错综复杂的资本全球积累格局中生成的中国道路成为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可资借鉴的经验原型，进而使科学社会主义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展现出更为巨大的生机活力，同样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直面的重大问题。

注释：

① 马克思提出过三种自然力：作为劳动力的“人的自然力”、“自然界的自然力”和“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702、443、38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79页。

⑤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5页。

⑥⑧⑨⑩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 - 199、575、587、464页。

⑪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21页。

⑫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7页。

⑬⑭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105页。

⑮ 该观点参考了相关学者的分析，见鲁品越：《社会主义诞生条件的分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8期。

⑯ 《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⑰ [美] 伯格斯坦等著，隆国强等译 《账簿中国：美国智库透视中国崛起》，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⑱ [英] 马丁·雅克著，张莉、刘曲译 《当中国统治世界》，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封二。

⑲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4页。

[责任编辑：何海根]